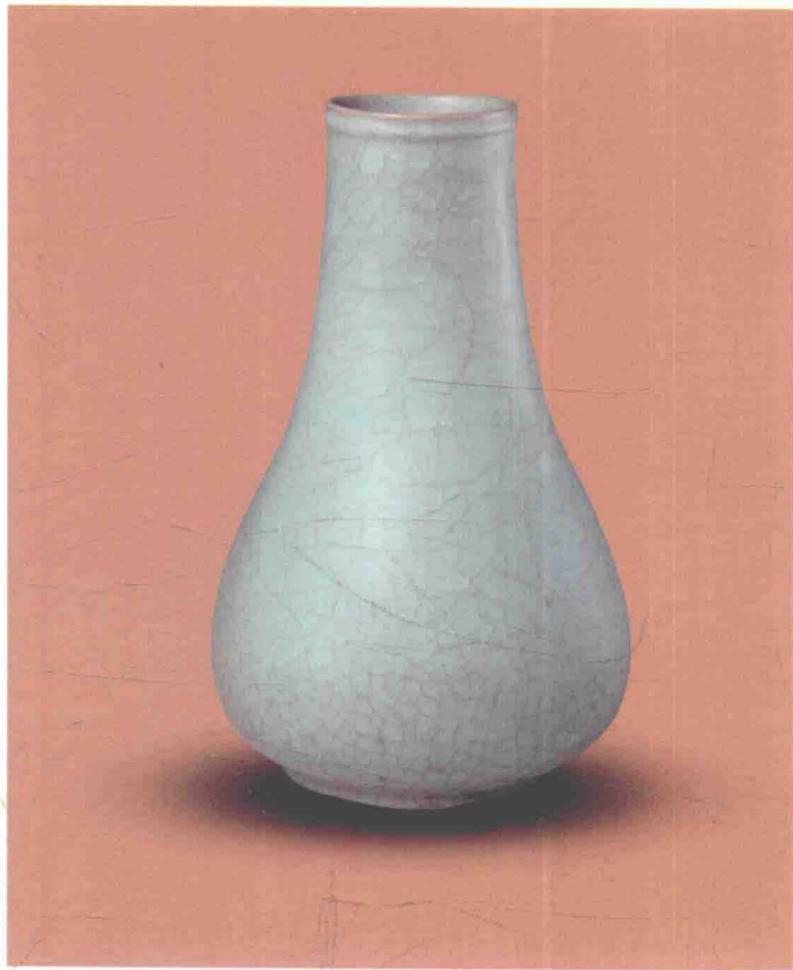


# 南宋皇城记忆

政协杭州市上城区委员会  
编



## 瓷中珍品

邓禾颖 / 著

杭州出版社

南宋皇城记忆

# 瓷中珍品

邓禾颖 / 著



杭州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瓷中珍品 / 邓禾颖著. — 杭州 : 杭州出版社,  
2017. 10

(南宋皇城记忆)

ISBN 978-7-5565-0711-5

I. ①瓷… II. ①邓… III. ①官窑—青瓷(考古)—介绍—中国—南宋 IV. ①K876. 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13588号

---

CI ZHONG ZHENPIN

## 瓷中珍品

邓禾颖 【著】

---

策划编辑 杨清华

责任编辑 夏斯斯

封面设计 顾明杰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 (杭州市西湖文化广场32号6楼)

电话: 0571-87997719 邮编: 310014

排 版 杭州真凯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字 数 70千

印 张 2.5

版 印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65-0711-5

定 价 29.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南宋皇城记忆》编委会

顾问 陈瑾 金承涛

主任 占仁义

副主任 陈少华

主编 陈少华

执行主编 陆峰

编委 (按姓氏笔画)

邓禾颖 卢英振 戎玉中 杨清华 何兆泉

应志良 陆峰 陈少华 林正秋 姜青青

徐吉军 龚玉和 傅伯星 潘沧桑

## 引　　言

曾为吴越国首府和南宋都城的杭州，不仅拥有“山外青山楼外楼”的旖旎风光，更因蕴涵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而跻身于中国七大古都的行列。她曾经历的辉煌给杭州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令今人备感自豪。这其中，代表了青瓷发展巅峰水平的南宋官窑，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南宋官窑，是宋室南渡、定都临安后，为满足宫廷祭祀、饮食、陈设及赏赐之用而设的瓷窑。它属于最早出现于公元十二世纪的宋官窑范畴，它们及其之后在景德镇设置的御窑厂，都是烧制皇宫高档用瓷的专用窑场。南宋官窑通过细致纯熟的工艺，将流畅简练的造型和精光内蕴的釉色和谐统一在一起，是南宋时期发达的科技文化真实的写照。在中国封建社会，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一方面使得这类专用窑场所进行的只能是纯产品性质的独断性生产，无法像其他普通商品那样进入民间流通；同时又因其专供皇室享用，故对其生产制作工艺要比同时期的民窑生产来得讲究的多，可谓不惜工本，因此它所生产的瓷器毫无疑问是那个时代瓷业最高成就的代表作。加之产量有限，传世甚少，从而成为中国古代瓷器中的瑰宝，闻名于世。

探讨南宋官窑的发生和发展，可以发现，它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厚的制瓷工艺源流和文化渊源。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又有着许多新的创意和提高，并对同时期的相关窑口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剖析官窑，一个青瓷传承与升华的发展脉络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 目 录

第一章 官窑溯源	1
第二章 官窑制度的初建与重建	5
第三章 窑址的发现和发掘	13
一、修内司官窑	13
二、郊坛下官窑	19
第四章 艺术特征	24
一、釉色——莹润如玉	24
二、胎色——紫口铁足	26
三、造型——古朴典雅	28
四、为世所珍	29
第五章 南宋官窑出土及传世器鉴赏	32
一、郊坛下遗址出土标本欣赏	32
二、老虎洞南宋官窑窑址出土标本鉴赏	41

三、杭州城市建设出土的南宋官窑标本鉴赏	48
四、南宋官窑传世器鉴赏	51
<b>第六章 历代对南宋官窑的仿制</b>	<b>56</b>
一、宋元时期的仿官生产	56
二、明清景德镇的仿官瓷生产	68
<b>结    语</b>	<b>73</b>

# 第一章 官窑溯源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在公元200年左右的东汉晚期，瓷器家族中的母亲瓷——青瓷率先在浙江上虞一带烧造成功，完成了由陶到瓷的飞跃。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青瓷不断发展完善，成为中国瓷器生产的主流。其历史之久、种类之繁、适用面之广，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上无与伦比。

自青瓷问世以来，便始终与历代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它不仅在民间广泛使用，也被达官贵族乃至帝王纳入他们的豪奢生活。在东汉至宋代的一千多年间，青瓷始终是朝廷偏爱的瓷种，故有学者称青瓷为瓷器史上位列第一的“帝王瓷”是丝毫不为过的。

从目前已知的文献记载看，最早被纳入皇室用瓷的应是唐、五代时的越窑青瓷。唐代瓷业的发展，使得瓷器成为生活中的必需品，尽管上层社会部分还固守着使用金银器、玉器等，但瓷器已逐步充当重要角色。唐代的越窑首创匣钵装烧法，使瓷器不仅釉面光洁，受火均匀，质量大为提高；且使得未经烧结的坯件免却承担重压的负荷，为削减坯体自身厚度提供了先决条件，使原先模仿以铸造法成型的厚胎青铜器为目标的瓷器，转变为模仿以模压法成型的薄胎金银器皿的形状和花纹，标志着瓷器品位的提高。越窑至晚唐、五代时形成了一个划时代的历史高峰，其最杰出的成就是烧制出了隐露精光、如冰似玉的“秘色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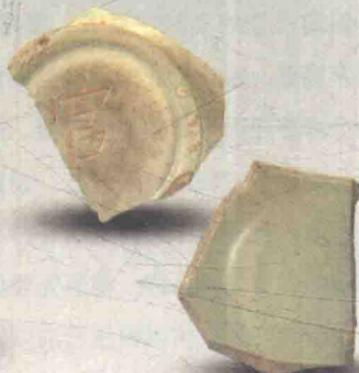
唐越窑青瓷褐云纹熏炉  
〔唐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



唐“秘色瓷”净瓶  
〔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



刻“官”款匣钵  
〔上林湖后司岙窑址出土〕



五代耀州窑天青釉“官”字款碗底残片  
〔耀州窑遗址出土〕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唐代诗人陆龟蒙的这首《秘色越器》向世人展示了越窑秘色瓷的神韵；而同朝诗人徐夤在《贡余秘色茶盏》中“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的吟诵，则是对秘色瓷产品性质的最好注脚，它表明，秘色瓷确是作为贡奉之用的。

自1958年以来，随着吴越国王陵和王室成员墓的陆续发现，清理出大量制作精美的越窑青瓷器，加深了人们对秘色瓷的认识。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了精心包裹的十三件越窑青瓷，与《衣物帐》称之为“瓷秘色”的记载相符，人们终于明白所谓秘色瓷指的就是越窑青瓷中那些釉色纯正、制作规整的精品。这些青瓷在装烧时一匣一件，器物外底留有若干支烧痕，是秘色瓷的实证，从此掀起了秘色瓷研究的热潮。从1990年开始，考古人员长期坚持对越窑遗址进行调查发掘。2017年初，获得重大考古成果，确定上林湖地区是越窑唐宋时期的窑业中心，其中后司岙窑址则是秘色瓷生产的中心窑场。在后司岙窑址发现的多个“官”字款的匣钵，可以确定是晚唐五代时期烧造宫廷用瓷的主要窑场，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最高制瓷水平。至此，秘色瓷的产品种类、生产工艺、烧造地点和产品性质等诸多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作为越窑青瓷上品的秘色瓷，其釉色之美、造型之宜，充分体现出贡瓷不惜工本、精工细作的特点，这种注重釉色、在设计上着力于秀美造型的时代特色，因其观赏价值越出了实用价值所需的历史阶段，而被后人称之为“唐时韵物”，在中国陶瓷史上第一次对瓷器提出类玉、类冰的明确审美要求，树立了中国古典陶瓷美学的第一面旗帜，也为宋代青瓷追求高雅素净的美学风格奠定了扎实的技术基础。

越窑的杰出成就，对遥远的北方耀州窑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唐代耀



州窑学习越窑烧造青瓷，改变了唐代中国瓷业“南青北白”的格局。它善于在学习中创新，于五代时创天青和淡天青釉新品种；同时在支烧方法上也进行了大胆革新，将唐代时支钉钉尖向下、放在器内心的支烧方法改变为五代的支钉钉尖向上、支在施了裹足釉的器外底或器足之上，器物烧成后，在其裹足釉的器外底或器足底留有三点、四点或五点支烧痕。到五代晚期，又新出现了足底刮釉，采用垫饼或垫环进行垫烧的方法。这与越窑长条形支烧工艺相比较，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采用创新法烧出来的瓷器，精美而实用，是宋代官窑系列产品支烧方法的起源。耀州窑至五代时器物的造型一改唐器的厚重而转为精巧秀美，受到大众喜爱，并一度于北宋时期成为贡瓷。从史料看，这种由民窑为适应宫廷所需烧制“贡瓷”的制度，一直延至宋代官窑建立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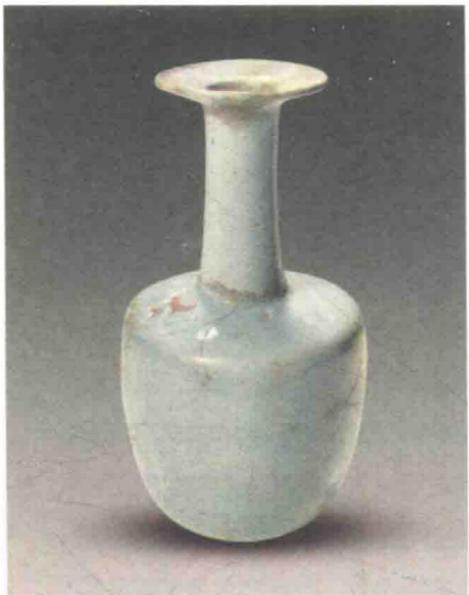


## 第二章 官窑制度的初建与重建

宋代是我国瓷业大发展时期，南北各地，窑场密布。皇室用瓷的需求量较之以前有进一步增长。宋代朝廷崇尚如碧玉般的青瓷，因此除定窑白瓷一度作过贡瓷外，朝廷用器基本以青瓷为主。北宋前期，由于浙江宁绍地区茶业兴盛、燃料匮乏、工匠雇值上升和沉重的窑业税等原因，越窑在经历了千年的辉煌后于北宋中期迅速衰落，由大规模的商品性生产转向就地销售的小规模生产，为减轻成本，产品制作也变得草率粗陋，与兴盛期的越窑产品已难望其项背。

随着越窑的衰落，一个崭新的青瓷品种在河南民间兴起并迅速发展起来，这就是汝窑青瓷。汝窑的发现颇费周折，前后经历了半个世纪之久。1950年，我国古陶瓷研究的前辈陈万里先生考察河南窑业，首先发现宝丰清凉寺瓷窑遗址。198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第一次试掘，发现典型的御用汝瓷器10余件，遂将宝丰清凉寺瓷窑址确定为汝官窑，200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第六次考古发掘，发现窑炉15座和作坊2处，出土了一大批比较完整的汝官窑瓷器、窑具和模具，找到了汝窑烧造御用瓷器的中心区域。清凉寺窑址所出青瓷，其制作工艺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以刻花为主要特征，另一类以釉层呈乳浊感的为上品，第三类以“芝麻花细小挣钉”支烧为标志。

汝窑深受越窑和耀州窑的影响，在造型上有一部分直接承袭越、耀



北宋汝窑青瓷盘口瓶  
(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出土)

两窑而来，如碗、盘类器物的圈足造型多向外翻卷，几乎就是越窑圈足的翻版；也有一些则是在两窑器皿中作进一步变化。在装饰上亦如此，越窑和耀州窑流行的刻画与剔刻莲瓣纹在汝窑瓷器上颇为多见。在烧造工艺上，汝窑器常使用的细小芝麻钉窑具即源自耀州窑。但汝窑最值得夸耀的，是发明了高温黏度较大的石灰碱釉——乳浊的天青釉，这是青瓷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里程碑，对后世乳浊釉青瓷的发展和繁荣，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

由于汝窑瓷器制作工艺相当精湛，加之宋代朝廷崇尚青瓷，故汝窑出现后，很快就获得朝廷的青睐，成为宫廷的首选用瓷。南宋陆游在他的《老学庵笔记》中有“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的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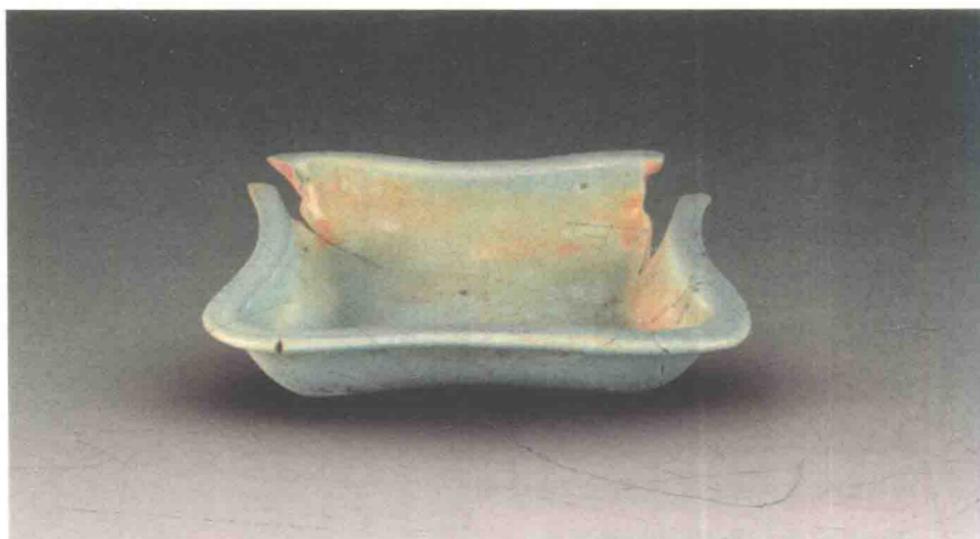
北宋时期，规模较大的手工业生产大多集中在官营和私营的手工业作坊，皇家消费品均在国家专设的手工业作坊中制造。就瓷器而言，由于贡瓷已满足不了朝廷的需要，更由于其显示不出“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由朝廷直接派官建立的官营瓷器作坊便应运而生，简称“官窑”。与贡窑相比，两者的经营性质有着根本的不同。首先，由于官窑是专门为皇室而设，所以，烧制的瓷器在造型、装饰、釉色等方面均按宫廷设计式样进行制作，具有浓郁的宫廷色彩。其次，官窑为满



足宫廷需要，对瓷器有更高的要求，它在工艺上精益求精，在经济上不惜工本，较贡瓷必定更胜一筹。再次，生产贡瓷的民窑，毕竟属于商品生产，在市场经济中互相模仿、竞争，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而官窑产品只能供皇宫内使用，普通官吏必须由皇帝赐给方能使用。因此，官窑具有非商品性、严禁民用的特点。官窑瓷器烧成后，为防流散民间，凡落选者均作打碎、深埋等特殊处理。南宋官窑的两处遗址发掘，出土成千上万的瓷片，在老虎洞南宋窑址甚至出现了专门用于填埋废弃瓷片的二十四个堆积坑，却几乎没有发现一件完整瓷器，就清楚证明了这一点，这也注定了官窑成品传世稀少的宿命。

南宋人叶寔在其笔记《坦斋笔衡》中云：“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这是迄今我们所掌握的最早也是唯一关于官窑建立的记载。有学者考证，邵成章系邵鄂之误。从中可知，官窑始创于北宋徽宗的政和年间。对于北宋官窑，因只见于文献记载和为数不多的传世品，学术界对此认识存在着不同见解。一般根据叶寔所言“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认为北宋除了汝窑，应另有北宋官窑，且官窑应在都城汴京（开封）或附近。但由于黄河历史上几次大的泛滥，汴京遗址早已掩埋于泥沙之下，是否有窑便成为陶瓷史上的一大悬案。

值得关注的是，1992—1998年间，在河南省汝州市文庙周围陆续发现汝官瓷配釉作坊和汝官瓷片、残器。汝州市是宋代的州治所在地，发



汝窑青瓷方盘残件（张公巷汝窑遗址出土）

现者认为“汝州文庙可能是汝官窑遗址”。2000年春，张公巷一居民盖房挖地基时，发现有匣钵和近似汝窑御用瓷器碎片。考古部门对张公巷窑进行了三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瓷片和窑具。所出瓷片胎骨细腻坚硬，以粉白胎为主，灰白胎次之，不见汝瓷的香灰胎。发掘者认为，张公巷窑址出土的窑具、瓷器特征与宝丰清凉寺御用汝窑工艺非常接近，可以肯定张公巷烧造的产品不是一般民间生活用瓷。并依据出土的匣钵外壁涂抹耐火泥工艺和较多类汝窑瓷器特征，推断汝窑与张公巷窑是承前启后的关系，即汝窑早、汝州张公巷窑晚。又根据明初曹昭《格古要论》“官窑……色好者与汝窑相类”的记载，综合判断汝州张公巷极有可能就是北宋官窑的所在地。但发掘者又谨慎表示，不完全否定张公巷窑是金、元时期仿“汝”或仿“官”的可能性。

笔者曾专赴河南汝州观摩张公巷窑出土标本，亦惊叹于该窑产品之



精美，其青瓷精品的质量绝不亚于清凉寺汝窑的同类产品，且制作之精巧程度还略胜清凉寺产品一筹，而其独特的粉白胎特征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按照叶真“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的说法，北宋朝廷先是命汝州造青窑器，继而又于政和间自置官窑烧造。但仅从“京师自置窑烧造”一句话，我们恐难断定朝廷究竟是在哪里设置的瓷窑。因此，张公巷窑的发现，无疑使得对汝窑和北宋官窑问题的探索进入更深入和复杂的研究领域。

毋庸置疑的是，官窑的建立并非空穴来风，无论其制作工艺还是窑工来源都与民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汝官窑到北宋官窑的发展，不仅仅是地理方位的转移，同时也映射出宫廷对于御用瓷器生产控制的逐步加强这一事实，反映了官窑制度的逐渐成熟。

公元1127年的靖康之难，徽钦二帝被俘，北宋王朝覆灭。康王赵构于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基，改年号为建炎，史称南宋，赵构就成了南宋的第一任皇帝，即宋高宗。南宋政权建立初年，在金兵的追击下，高宗先后驻跸扬州、杭州、建康（今江苏南京）、平江（今江苏苏州）、临安（建炎三年七月将杭州升为临安府）等地，甚至一度还自明州（今浙江宁波）浮舟海上，经定海（今镇海）逃往台、温，以避金兵锋芒。于绍兴八年，正式定都临安。

在靖康之难中，宋朝宫廷的仪器法物及日常用器被金人席卷而去。朝廷初到江浙，对瓷器的需求量相当大，除了满足宫廷日用之需，还要大量用作祭器。这是由于当时财力薄弱、铜料稀缺，无法大量重铸渡江时已尽毁的铜玉礼器，故绍兴年间的祭典活动，多数祭器从俭改用陶瓷器及木器。这在《咸淳临安志·郊庙》中有详细记载：“祭器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卤簿应用文绣者，皆以缬代之”。据史料记载，宋高宗